

长安

与唐五代小说研究

张同利◎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长安

与唐五代小说研究

张同利 著



人民
出版
社

责任编辑:汪逸

封面设计:石笑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安与唐五代小说研究/张同利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6
ISBN 978-7-01-014962-2

I. ①长… II. ①张… III. ①古典小说-小说研究-中国-唐代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36966号



长安与唐五代小说研究

CHANG'AN YU TANGWUDAI XIAOSHUO YANJIU

张同利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23

字数:338千字

ISBN 978-7-01-014962-2 定价:48.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李剑国

长安，这座历史上的帝王之都，因牵系着大汉、大唐，成为最响亮的名字，大概只有后来的北京城堪相比肩。李敖说，要做古人就做唐朝人。我说，要做唐朝人，就做长安人。

可惜，唐末长安就开始败落了。1924年鲁迅先生来西安讲学，面对衰败的古城无限感慨——“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鲁迅书信集》下卷《致山本初枝》）2005年9月我到西北大学参加《海峡两岸中国古代文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一次来西安，心中揣着一张唐代长安城坊图好寻访遗迹。但看那由新修的明城墙围起来的逼狭破旧的老西安城，怎么也和“千门万户玉楼台”（李端《昭君词》）的大唐长安联系不起来。看那“大唐芙蓉园”，也不敢相信这就是宋之问春日侍宴所见“烟气笼青阁，流文荡画桥”（《春日芙蓉园侍宴应制》）和王建“芙蓉园里看花”（《宫中三台词》）的芙蓉园，怕是似是而非的伪造。算来也就是依然巍立的大雁塔给大慈恩寺留下点念想。我在大会发言中感叹道，长安物华荡然无存矣。

逝者如斯，毕竟过去一千几百年了。让我们的神思穿越历史，去探访那个伟大的王朝、伟大的都市。

唐长安城建于隋，初名大兴城，唐加以扩充改建。城池呈四方形，考古探测数据表明，总面积84余平方公里，据说是明代西安城的9.7倍。加上城外官苑、近郊别墅等，长安的实际范围更大。长安城人口100余万，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而且西域胡人、

东夷海客,在长安求学、问法、仕宦、经商,长安道上外邦使臣络绎不绝,长安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这里有雄丽庄严的皇宫皇城,有景色烂漫的东苑西苑,有南北纵横的街衢,有星罗棋布的里坊,有店铺栉比的二市,有屈曲相通的长渠,有清秋登高的乐游原,有春日赏花的曲江池,有新科进士题名的慈恩寺,也有娼户妓女纳客的平康里……郊外,北渡渭水长桥,南望终南积雪,东折霸陵垂柳,西驱咸阳古道。这里的帝王贵戚、达官显宦、书生文士、富豪贫民,男女老少,三教九流,天天发生着可喜可悲可诧可叹的故事,以致千百年来无数后人还在说还在写还在演还在唱还在画。“长安多少风和月,不尽先生吟醉情。”(元刘秉忠《太白还山图》)“闻道长安全盛时,年年此日是佳期。”(元戴良《七夕有感》)“儿女不知秋塞远,宵分祇解说长安。”(清陈文述《边月》)“驴背小诗吟杜曲,酒边短烛话长安。”(清张问陶《发西安》)在文人笔下长安甚至成为历朝都城的代称。——历史记忆中的长安永不褪色。

我在西北大学认识了正在读硕士的张同利,一年后他成为我的门生。大约他在西安读书的因缘,这个山东年轻人对长安情有独钟,选定了《长安与唐五代小说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三年过去,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得到答辩委员们的充分肯定。2009年毕业后他任教于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至今已六年。此间他在教学之余对旧作做了全面修改,重新调整安排了章节,对照两稿的目录便会知晓。

长安与唐五代小说,是这项研究的两大关目。简单地说,就是研究“长安中的小说”和“小说中的长安”。在我看来,围绕这二者需要解决这样几个重要问题,就是长安在唐五代小说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作用是如何发挥的,长安在小说中得到怎样的反映,表现在哪些地方,这些反映表现出唐五代人怎样的观念和情感,体现着怎样的时代特征。应当说,这些重要问题,同利博士在书中都给出很好的论述,自然他有自己的理论构想、书写策略和论证逻辑。

本书的《绪言》对其基本构想和主要论点作了概括:长安作为唐五代最为重要的地理和文化中心,产生了大量的都城故事,造就了一批作

家。长安成为唐五代小说创作和繁荣的主要发动机和助推器。正是凭借长安地区渐次形成的“古今中外各民族大交融、大吸收的混合型、开放型、进取型”文化积淀,和长安城所提供的特殊的文化地理空间,汇聚长安的小说家能够以空前的热情和信心创作和传播小说,同时也以其巨大的影响力感染和召唤着各地文人对小说的搜集、整理和创作。研究长安与唐五代小说之间的关系,其重点乃在于:以长安的地理空间和政治文化空间为基础,深入分析唐五代小说的创作过程、材料来源、思想内容、文化内涵、形象特征以及艺术特色等。——这一概括,大体也正是对我前边提出问题的回答。

第一章《长安的地理文化环境》,详细论证了长安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渊源以及长安的区域范围、里坊空间和政治中心特征。这并不是孤立单纯地介绍长安,而是预设下小说创作的特别环境。任何文学创作都离不开一定的自然人文环境,对于小说创作来说,人文环境尤为重要。正如同利在《绪言》中所说,长安既是一个地理空间,更是一个文化空间。提升起来说,我以为长安有自己独特的城市风格,它是大唐气象的缩影,是唐人文化精神的凝聚。大气、豪迈、开放、包容、通达、进取,这是它的精神特质。对这一精神的深刻把握,乃是研究“长安中的小说”和“小说中的长安”的关键所在。

第二章《士人在长安的小说创作》,开始正式进入论题,概括地说就是长安提供了怎样的环境、机制和动力使士人进入小说创作,而士人在长安的小说创作又有怎样的特点和含有怎样的意图。书中从话谈、闲游中的素材搜集、闲职、闲居情形下的创作、京中生活与创作旨意、文友聚会切磋、家族群体创作现象五个方面论述,相当完善。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长安文人或居官或居住,他们的活动,他们的追求,他们的命运,都和长安这个政治中心密切相关,因此他们的小说创作就被笼罩在长安特有的政治文化氛围中。同利说,长安社会环境对这些小说作家的影响主要不在艺术风格上,那些在政治中心召唤下聚集到长安的士子文人,在这里特别关心的是政治动向和自己的政治前途。他们在长安的主要行为和动机,都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能够进入他们视域范

围之内的故事或传说,也就更多的与士人生活息息相关。而其创作的动机,也大都归旨于治国之道、人伦之理。我以为,虽然也有猎奇逐异的、游心娱目的,但就创作主流看,这一论点大体不差。自然长安之外的小说创作,也有类似的特征,但在这天子脚下、百官之都,空气中都充满政治气味,这一情况也就更为突出。

以下四章便展开论述所谓“小说中的长安”这一论题。自然这里说的“长安”并不是指长安城或长安地区这个地理人文空间,而主要是讲长安中的人。《士人的都城命运故事》讲的是士人。我说过,唐人小说的特质属于士人文学,而不是宋元话本那样的市井文学。唐人小说主要由士人创作,对士人自身的关注自然是其主体。士人都城命运故事的主题大都是功名、仕途、婚姻,潜藏着的是命定思想。小说中反映的命定论很早就有,但讲功名仕宦婚姻命定却在唐代大量出现。这和唐代的科举制度、铨选制度、婚姻制度及门阀观念密切相关。在唐代士人中,成功者毕竟是少数,即便是成功者也常常乐极生悲,命运的莫测着实让人困惑和伤感。同利说,唐五代都城命运故事呈现出一定的悲剧色彩,蕴涵的是对于士人政治命运的忧患和哀痛。确实如此。——顺便说,同利师从西北大学李芳民教授读硕士,学位论文是《唐代定命类小说文学研究》,这部分的论述自有其扎实基础。

《都城叙事》由士人扩展到整个长安社会,描述和展现唐五代小说中丰富多彩的长安社会风情画卷。涉及长安城的社会风尚、世态人情以及居民的精神面貌、行为习惯等。内容非常广泛,具体有居民游观、长安游侠、异域情调、北里浮华、城南遗事、百姓小传、仆卒剪影。此中最值得关注的是“长安游侠”和“北里浮华”,因为它们关系到唐人多种著名的小说作品和故事,是“长安小说”显眼的题材。对前者同利总结道:侠客故事反映了人们对侠义精神的崇尚,侠已由一种客观实体或行为升华为一种精神或曰气质性的东西,具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对于后者,他简略分析了《北里志》《柳氏传》《李娃传》《霍小玉传》等名作的内容。北里即平康里,在长安外郭城靠北。里中东北隅的三曲(三条小巷)是妓女居住地——李娃就曾住在这里的

鸣珂曲。“浮华”是对士子和膏粱子弟们说的,对妓女而言,表面的“浮华”掩盖着辛酸和泪水。这些发生在长安的士妓恋爱的悲喜剧,有着它发生的体制原因和社会风气原因,如妓女制度和冶游风气等,实际反映着风尘女子们的生存状况,反映着士人的女性观和价值观。这节的论述还可以深入细致一些。

《神异都城描写》由现实转向超现实的描写,在众多的唐五代小说中,长安成为仙人降临和异人云集的神奇之城、精怪集聚的怪异之城,对于后者他颇为形象地称作长安“九鼎图”——借用大禹铸九鼎以象魑魅魍魉的传说。此章《长安“双城记”》这一节论述很别致,应当特别提出。所谓“双城记”指的是现实之城与虚幻之城,前者指真实的长安城,后者指小说中的鬼神之城。具体说,唐代复生故事中,在鬼神引导下,主人公由长安城某里坊居所出发来到某一鬼神之城,二者互为“他者”,并峙对立,但又互通互连,从而显示出“双城”的同一性。同利认为,在唐五代小说中,长安“双城”形象的出现,是古代都城发展过程中,民间信仰和宗教观念在人们城市观念上的形象展现。人们出于自己的精神需求,需要在“城外”构建一个用以解决自身命运困惑的城市,并以之作为命运的依靠,因此它有意在这鬼神之城中放大长安城的政治权力工具性特征和宗教化色彩。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这真假两座城具有亦即亦离、不即不离的双重特性,“双城”之间反观对方,既互为“他者”,各有其意义指向,又形同一体。就是说它们互为投影,互为补充。因此,如同利所说,鬼神之城其实就是真实长安城的“镜像”,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唐代长安城的本质特征。同利在注释中说明了“双城”理论来源于英国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后来被李欧梵借用来作为香港和上海的比较研究,研究二者的同一性和对立性,凸显各自的都市性格。同利则借用这一概念和理论,用作唐五代小说中长安和冥域这一实一虚的关系研究,无疑是一个创新,论述也未见牵强附会之弊,应予充分肯定。

大唐三百年出现过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尤其是后者,由开元到天宝延续了四十多年。但好日子被安史之乱毁掉了。以后虽有宣宗号称

“中兴”，但“自是而后唐衰矣”。（《新唐书·宣宗纪》赞）对开元天宝盛世的怀念和追忆，是中晚唐乃至五代人小说创作的重要题材，末章《都城历史记忆》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召回“失去的长安”。同利指出：“唐五代开天遗事题材小说，以长安为主要故事发生地，以李杨及其周围人物为核心，细致详尽地书写了一群人、一个城的兴衰成败。并由一人一城，言说国家命运，寄寓国家政治兴衰成败的讽喻之旨，都城‘长安’遂成为‘国家’寓言。”论点妥帖允当。确实如此，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像长安这样代表着唐朝，它的兴衰就是大唐的兴衰。当先天二年（713年）玄宗在渭滨讲武打猎姚元崇（姚崇原名）上献十事时，便开启了“开元全盛日”；当天宝十五载（756年）玄宗避安禄山叛乱从长安仓皇出逃时，大唐气象便骤然惨淡；当天祐元年（904年）朱全忠（朱温）胁迫昭宗迁都洛阳而拆毁长安城时，大唐三年后也就彻底崩塌了。中晚唐小说家回首往日长安，骄傲自豪；反观现实乱象，失落彷徨。而当后唐王仁裕在长安撰写《开元天宝遗事》时，此唐已非彼唐，此城已非彼城，长安已如“西风残照”中的“汉家陵阙”，只能拾点掌故，遥思失去的长安了。

研究城市文化向为学者所看重，长安作为大唐首都是一座特殊城市，其内涵之丰裕厚重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从上边我粗略介绍的情况来看，研究“长安小说”不是件轻松的事情，它数量庞大，题材丰富，观念复杂，梳理清楚殊非易事。同利驾驭这个题目虽不能说是举重若轻，游刃有余，倒也从容淡定，有条不紊。他紧紧把握住长安的空间结构、政治生态、人情物貌、众生百相，努力探寻其中所隐伏和包含的制度、观念、信仰和社会心态，努力发掘表象之下的意义和价值。他的努力是成功的。

他在《绪言》中说“长安与唐五代小说”是一项综合性课题，需要运用诸如文学、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众多学科的知识，对其进行深入研讨。这些理论工具的运用是得体的、到位的。他还提到方法运用，即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文献学的方法、图示和图表法。长安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历史问题，因此小说研究也必须从社会历史入

手,而小说及历史又关涉大量文献,自然离不开文献学方法。这些无须多讲。我很赞赏的是图示和图表法的运用,就此多说几句。司马迁《史记》开创十表,前代许多学者对太史公这一创举大加称赞。刘知幾《史通·杂说上》说:“观太史公之创表也,于帝王则叙其子孙,于公侯则纪其年月。列行萦纆以相属,编字戢耆而相排。虽燕越万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于方寸之中雁行有叙。使读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此其所以为快也。”郑樵《通志总序》说:“《史记》一书,功在十表。”清人朱鹤龄《愚庵小集》卷一三《读后汉书》说:“马迁《史记》帝纪之后即有十表……年经月纬,一览了如,作史体裁,莫大于是。”史迁所创之表,后为《汉书》《新唐书》《宋史》等效仿。就学者而言,近世国学大师梁启超就喜用善用图表法,他曾说:“吾生平读书最喜造表,顷著述中之《中国佛教史》,已造之表已二十余。”(《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六章《史迹之论次》)再如他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梁启超全集》第三卷),图表多达十八张。梁启超特别赞赏史迁这一开创,说:“自《史记》创立十表,开著作家无量法门。”(《中国历史研究法·史迹之论次》)这个法门被同利领会到了。同利此书正文也有三张图表,附录中更是列出《唐长安旅店、商铺等统计表》《唐长安佛寺统计表》《唐长安道观统计表》《长安小说统计表》四大张图表。这种一览表的好处是明显的,清晰醒目,便于概览,一表在目,全貌尽知,成为文字论述的有力辅助。书中还穿插了许多示意图,直观形象,也是文字的很好提示和补充。

同利此书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来函求序,应请草就数千言如上。同利治学勤奋,前年又申请到一项国家青年项目。他的同窗云南师大文学院张玉莲博士也同时申请到国家青年项目。闻讯后我曾作七律一首赠送他们,题为《二张得国家项目作五十六字以赠》,这里不妨抄在下边以为此序收束,诗曰:

喜闻探得九渊珠,念罢殷墟思翠湖。

仙传深究老子道,珍图细说小人书。

蚁生有限驹光促，鲸海无涯蜃浪呼。

待到功成停笔日，为伊作序再操觚。

2015年4月13—17日

草于南开大学文学院钓雪斋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章 长安的地理文化环境	8
第一节 长安的地理环境	8
第二节 长安的历史文化渊源	10
第三节 隋唐长安的地理范围	15
第四节 隋唐长安城的里坊空间	20
第五节 长安的政治中心特征	28
第二章 士人在长安的小说创作	33
第一节 话谈、闲游中的素材搜集	37
第二节 闲职、闲居情形下的创作	43
第三节 京中生活与创作旨意	45
第四节 文友聚会切磋	48
第五节 家族群体创作现象	51
第三章 士人的都城命运故事	56
第一节 长安的政治中心场景	56
第二节 士人都城命运故事	64
第三节 士人都城命运故事的文化内涵	74
第四章 都城叙事	80
第一节 居民游观	80
第二节 长安游侠	83
第三节 异域情调	85

第四节	北里浮华	88
第五节	城南遗事	90
第六节	百姓小传	94
第七节	仆卒剪影	96
第五章	神异都城描写	101
第一节	长安的神迹仙踪	102
第二节	长安的奇人异术	111
第三节	长安“九鼎图”	119
第四节	长安“双城记”	132
第六章	都城历史记忆	147
第一节	失去的长安城	147
第二节	找回失落的长安遗事	149
第三节	开天之际的理想之城	152
第四节	安史乱后的失落之城	165
第五节	长安成为“国家”寓言	172
结 语		177
附 录		180
一、唐长安旅店、商铺等统计表		180
二、唐长安佛寺统计表		186
三、唐长安道观统计表		190
四、唐五代“长安小说”统计表		192
五、唐五代长安里坊宫室故事辑录		210
六、唐五代“长安小说”刍议		324
参考文献		343
后 记		352

绪 言

唐长安是人类历史长河中重要的人文汇聚之都,对于它的关注和研究,可谓代不乏人。及至现代,学术界的长安研究,尚不能与“敦煌学”这样的显学相媲美,其研究实绩也无法与它理当有的地位相提并论,但总体来说,“长安学”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也是不争的事实。^①尤其是随着长安考古工作的开展和有关文献资料的整理,以及有关都城制度文化等的探讨,唐代长安的面貌正日益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而以丰富的长安资料为基础,探讨它与历史、社会、政治、文化乃至文学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意,“长安与唐五代小说研究”正是在此契机下的一个尝试。

长安作为唐五代最为重要的地理和文化中心,产生了大量的都城故事、造就了一批作家。就唐五代小说繁荣昌盛的原因来说,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长安,实际上成为它的主要发动机和助推器,正

^① 荣新江在《关于隋唐长安研究的几点思考》中既已指出:“笔者在研究隋唐史和敦煌学的过程中,不断在思考一个问题,即长安是兴盛的大唐帝国的首都,敦煌是唐朝丝绸之路上的边陲重镇,由于特殊的原因,敦煌藏经洞和敦煌石窟保留了丰富的文献和图像资料,引发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敦煌学研究热潮;相反,虽然有关长安的资料并不少于敦煌,但因为材料分散,又不是集中被发现,所以有关长安的研究远不如敦煌的研究那样丰富多彩,甚至也没有建立起像‘敦煌学’那样的‘长安学’来。然而,只要我们读一下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关于长安千福寺的记载,看一看《旧唐书》卷一〇二《韦述传》关于其家藏文献文物的有关文字,我们就可以断言,敦煌资料的丰富远远不能和长安相比拟。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惊叹敦煌艺术的精美,那当年长安寺院的图画一定更加精美绝伦;如果我们说敦煌文献丰富多彩,那也只是长安寺院藏经阁或学者书斋的冰山一角。”参见《唐研究》第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是凭借长安地区渐次形成的“古今中外各民族大交融、大吸收的混合型、开放型、进取型”^①文化积淀,和长安城所提供的特殊的文化地理空间,汇聚长安的小说家以空前的热情和信心创作、传播小说;长期以来形成的长安中心地位的感召力和向心力,不仅造成了各地文人以嗜奇心态将带有地域特色的故事齐聚长安,而且还以炫耀的口吻将长安的“丈人剧谈,卿相新语”作为谈资播于天下,长安地区特殊的环境所造就的小说创作群体和创作风气,也以其巨大的影响力感染和召唤着奔赴各地的文人对小说的搜集、整理和创作;甚至在长安地区丧失其中心地位以后,它仍然以其长期以来在文人内心形成的文化上的惯性感召力影响着各地的小说创作。长安与唐五代小说这一论题的意义不言而喻。

近些年学界对这一论题也有所关注。台湾学者许雪玲《唐代游历仙境小说与长安文化之关系》(《第二届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995年),认为唐长安的崇道世风和道教神仙思想在长安的风行是唐代游历仙境小说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这是从长安社会文化背景的角度来研究唐小说的重要尝试。又有文美英《唐人小说中的长安城——以传奇为主》(中央大学中文所硕士论文,1997年6月),论文除了序言和结语之外,主要有历史认知中的长安、文学摹写中的红尘长安、长安故事的精神象征等,其中文学摹写中的红尘长安、长安故事的精神象征无疑是该文的论述重点。作者将唐传奇看作一种用以考证长安物质生活和精神意识的资料,透过小说文本来观察唐人在长安的生活,并进一步论析长安故事中所表现的刚健不息的积极精神。作者将“长安”与“文学”紧密结合,以凸显唐人的活动在历史变迁中的意义,从而展现唐人的时代精神,这是本论文的成功之处。但这种单向度的探讨,对文学研究来说显然是不够的。日本学者妹尾达彦《唐代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以〈李娃传〉的分析为中心》(《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一文,通过对传奇小说《李娃传》

^① 黄新亚:《长安文化与现代化》,《读书》1986年第12期。

的分析,揭示了长安城市结构的变化,同时兼顾分析了当时长安的庶民文化。论文充分运用唐长安研究的大量现存资料和成果,按照小说主人公在长安活动的轨迹,依次分析了街东、街西、承天门街的结构布局以及民众文化情况,最后结合唐代其他的小说,重新分析了《李娃传》的特点。认为:许多小说都采用了特定的空间所酝酿出来的真实感,通过这些各具意义的街名,使长安社会为唐代小说提供了生动的舞台。从写作方法上来说,利用唐小说地名真实性的特点,以小说和长安史料相互参证,不仅可以为方兴未艾的长安研究提供绝佳的精神文化和庶民生活例证,而且也向我们展示了把唐代小说研究和长安研究结合起来的可能性。朱玉麒的《隋唐文学人物与长安里坊空间》(《唐研究》第9卷,2003年版),正是在妹氏思路启发下的重要创获。作者把论题进一步扩大,以唐代的“小说类作品”为基本研究对象,以“地理空间观”为阅读方法,从文学人物在坊里空间的活动,来展示唐小说虚构方法借鉴现实社会风情的艺术价值。文章从长安作为重要的信息社会给小说类作品场景描写带来的机遇,城市的公共场所给人物的冲突造就的合理氛围,坊里空间的人物分布和市场结构给故事经营造成的个性化特征,以及庶民信仰的建筑物在人物形象塑造中具有的日常性等几方面论述。认为读者对于人物形象的记忆,是在作者依据现实而创作的地理空间中逐渐完成的,真实的地理空间可以引发读者对故事人物的亲近感,地理空间的重要性在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不言而喻。小说与史料相互参证仍然是这篇论文的基本方法,但更为广阔的视域,更为准确到位的结论,则使得这一研究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其《唐宋都城小说的地理空间变迁》(《唐研究》第11卷,2005年版)同样涉及了长安地理空间和小说关系的讨论,从空间演变的视角来审视长安在唐小说中的表现和影响。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一,在研究范围上,学者仅就“长安城”本身所提供的坊里空间这一狭小的范围来透视和解析唐五代小说,而长安与唐五代小说的关系显然要更为复杂。二,就研究的深度来说,目前学界对长安精神内涵和空间特征及其与唐五代小说的关系有了初步的分析论证,但对长安精神特质的把握和它于唐五代

小说深层次影响并未予以深究。三,在研究的方法上,学者们以长安文化和坊里空间为背景,主要把唐五代小说作为长安城市文化的研究资料,对“长安与唐五代小说”这一论题的文学意义还没有足够的重视。因此,有必要对这一论题进一步作全面深入的探讨。

“长安与唐五代小说”是一项综合性课题,它需要运用诸如文学、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众多学科的知识,对其进行深入研讨。但很显然,作为文学研究,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绝不能将长安与唐五代小说之间的关系,仅仅作反映或者影响这样空疏的理解,更不能将唐五代小说作为一种研究长安社会的文献资料,其重点乃在于:以长安的地理空间和政治文化空间为基础,深入分析它与唐五代小说的关系,从而对唐五代小说的创作过程、材料来源、思想内容、文化内涵、形象特征以及艺术特色等有更深入的理解。^①

如果将“长安”看作一个与唐五代小说有重要关联的空间环境,那么它既是一个地理空间,更是一个文化空间。说它是地理空间,是因为它有大致的区域范围,在此区域范围内它具有大量的物质实体,例如山川、草木、建筑、居民等,就是说地理空间更考虑其作为“场所”的特征。说它是文化空间,是因为在这个“场所”内,它的居民具有独立或独特的生活方式、行为特征,例如民俗节令、生活习惯、精神面貌、宗教信仰等等,文化空间更多地考虑其保持传统延续性的“文化”特征。当然,长安作为唐五代小说创作与传播的重要空间,本身既具有横向的共时性地域文化特征,又具有纵向的历时性地域文化特征,它囊括了特定时空中现有的所有生活样态,有时又应当作为一个时空概念去理解。

作为研究对象的“唐五代小说”,本书将主要依据李剑国先生在《文言小说的理论研究与基础研究——关于文言小说研究的几点看

① (美)雷·韦勒克、奥·沃伦著《文学理论》在讨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时指出:“倘若研究者只是想当然地把文学单纯当作生活的一面镜子,生活的一种翻版,或把文学当作一种社会文献,这类研究就似乎没有什么价值。只有当我们了解所研究的小说家的艺术手法,并且能够具体地而不是空泛地说明作品中的生活画面与它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是什么关系,这样的研究才有意义。”(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4页)